



王伯勤同志遺像

小浦聞魚躍

橫林待鶴歸

聞雲不成雨

故停碧山飛

五言詩
陸游詠秋江柳橋晚眺

王伯勛

王伯勛同志遺墨

目 录

- 一、写在前面
- 二、故乡、家庭、童年…………… 1
- 三、学兵生活与“五四”运动…………… 8
- 四、初期军人生涯与波折…………… 13
- 五、南昌起义前后的黔军处境…………… 16
- 六、从蒋桂战争到“一·二八”事变 25
- 七、回黔任职与奉命阻扰红军长征…………… 29
- 八、参加抗日战争与进入陆军大学…………… 35
- 九、滇缅路上远征军与松山之战…………… 41
- 十、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概况…………… 46
- 十一、在十九兵团任职前后的贵州形势…………… 56
- 十二、顺民心在兴仁专区率部起义…………… 68

王伯勋 口述

王贵屏 整理

故乡、家庭、童年

清末庚子年，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一九〇〇年，我出生于贵州省安龙县城的一个书香之家。祖辈、父辈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读书人。

我的家乡安龙，是个人民勤劳、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名胜古迹较多的地方。明末永历帝曾在这里避难。跟随永历帝的十八个大学士都在此惨遭孙可望的杀害，后人为他们修建了“十八先生”祠和墓，墓前有石牌坊，祠内外有悼念他们的碑文，祠后岩壁上有不少石刻。

清王朝统治时期，安龙是兴义府的所在地。康熙年间，平边大将招国遴，在天然湖群“坡塘海子”上修筑了一条长堤，即人们所称的“招堤”。堤岸垂柳轻拂，池中荷花飘香。游人留有“凭栏十里菱荷香”和“吹送荷花十里香”等诗句。我的伯父王金甲公，亦作有“步

步引人花柳偏迎堤上路，行行且住蓬莱回望水中央”的对联。堤尽处有小山，山上有亭，亭内有张之洞所作的“半山亭记”碑刻。张之洞的父亲张镆，曾在安龙任兴义知府。张之洞与我祖父王允嘉公同庚，是同窗好友，我家中有张之洞书赠祖父的对联“独立千载谁与友，往看万壑争交流”。

张之洞少时，与鹿传霖常击入于宋宠三长辈门下读书，张、鹿被清廷重用后，宋家以有这样两个门生为荣。①

张之洞在清廷担任要职后，仍念念不忘他青少年时代居住过的贵州兴义府，他想要为兴义府培养一批人才。我的岳父洗国琮（号极珊），就是张之洞选往湖北去培养的洋务人员之一，可惜才三十多岁就病逝了。听说，张之洞还命他的侄儿到兴义府挑选一些青年。到武汉去进陆军中学。那时，我还是个儿童，听大人们说，被选去的有王立斋、黄捷三、陆天香、郑子立、袁祖铭等老大哥，心中十分羡慕。②

由于张之洞父子很重视对兴义府青年的培

养，当地的绅士父老们对他十分感激。因此，张镡虽未死在兴义府任上，但安龙仍给他修建了“张公祠”。立碑那天，众多人抬碑穿城西过，一路敲锣打鼓，鞭炮之声不绝，前呼后拥，十分热闹。

我祖父王允嘉公，父亲王金堤（号尧功）公都是岁贡进士。伯父王金甲公是殿试进士。因此，在安龙有“一门三进士”之称。在我家朝门上，有知府石晓峰赠送的“进士”匾额。堂屋内还挂有石知府书赠的对联：“堂下三槐不让于古，庭前双桂健美乎今”。

我祖辈父辈虽然都是安龙知名的读书人，但无人为官，主要是从事教学。用我伯父的话来说，是“舌耕”之家，意即靠教书吃饭。我伯父的文章、诗词都有些名气，他每有新作，安龙当时的读书人争相转抄传诵。

我父亲在私塾教书。他眼睛不好，性情急躁，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不守师规者，常受惩罚。一次，我的堂兄弟王廷珪背不好书，他狠狠地责打，我伯母见儿子被罚，心里很不是滋

味，也帮着打，而且边打边骂：“你不好好读书哄得了谁？还不是只有哄瞎子！……。”我父亲因自己的眼睛不好，认为是伯母有意骂他，赌气再也不教廷珪了。从此，两房人为子女常有矛盾。

我四岁开始进私塾读书，因记性好，肯用功，祖父、伯父和父亲都较喜爱我。记得我五岁时，伯父出对子“雪消成水”，我对“烟上成云”，伯父很赞赏，鼓励我说：“好好读书！要记住，你是生在国难当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攻进我国的北京城，杀死了无数百姓，抢走了许多国宝，要从小立志为国雪耻”。

我八岁时，由父母作主定了亲，对象是比我大两岁的小朋友。未定亲时两人常在一起玩，定亲以后就不准在一起玩了。我的岳父洗国琮，祖籍广东，是张之洞的学生、父辈的挚友，他家虽在安龙，但他本人常年在湖北供职。他性格开朗，对诗、词、书、画都有研究，可惜在我不到十岁时他就病逝了，遗下孤儿寡母，不懂得珍藏他留下的书画，以致全都散失

了。实在可惜！

我十一岁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建立了民国，新的教育方式在全国兴起，如雨后春笋。安龙也兴办了国民小学，第一任校是费培本（贵州石阡人）。他原是清末的秀才，经贵阳优级师范培训后，被任命到安龙当校长。

费上任后，很重视选择教师，由他聘请的教师都很有学问。最受学生敬佩的是国文教员张鸿藻和历史教员刘阳迪。他俩都是清末的举人，后来又到日本留过学。记得刘阳迪在历史课中讲到文天祥时说：文天祥是个状元。在科举时代，状元三年就可以考出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文天祥不同于一般的状元，他是忠臣义士，宁死不屈，写了《正气歌》。你们学历史，就要学做文天祥这样的有志之士。

我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到安龙高堡壑大姨父家过年，姨父普老先生邀请弄外地来的教书先生黄某共同进餐。黄先生喝了几盅酒，摇头晃脑地说：今日普老先生盛情，真乃

难越无贤主，萍水相逢有贤东”啊！我说：《滕王阁序》上说的是“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黄先生惊讶地说：“聪明，聪明！真是后生可畏。”第二天，黄先生一早就走了。亲友们都说，黄先生原以为安龙是边远县份，文化极低，而今他眼见安龙的小孩能即席应时，当然只好悄然离去了。

我在小学毕业时，为了是否名列第一，有过一场小风波。当时评定学生的名次，是按语学兼优的情况而定的。宗族的兄长王亚明（解放前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与我同班，他的成绩也很好。学监陆天香是王亚明的至亲，有意让他获第一名，就造舆论说我虽然分数稍高，但是有些骄傲。这就引起了同学文选全、文选全和李其文代我不平，他们哄传陆先生徇私。最后，学校评定我为第一名，王亚明为第二名。这件事，说明辛亥革命后的民主思想，已影响到学生。

春节过后不久，我随高年级的同乡由安龙

步行了十天到贵阳升学。后来，我考取了模范中学。当时，该校学生的座位，是按考试成绩依次排列的。我和兴义人李居平（解放前是立法委员）轮着考第一名，弄得两人都不好意思坐第一位。学监杨孝祈知道后，叫我们去谈话，他说：“你们要互相勉励，不可互相不服气”。

在模范中学读书期间，对我震动最大的，是袁世凯称帝引起人们不满的情势。黔军中，王文华等积极响应云南蔡锷、唐继尧的讨袁活动，率部队入湖南参加战斗。

当时，听说王文华对其舅父刘显世（贵州督军）拥袁称帝，极为不满。王对他手下的人说：“谁胆敢到督军处去讨好，我就对他不住。”王文华的言行很得人心，当他从湖南凯旋归来，贵阳满城的人兴高采烈地自动走出家门，形成了从圈云关到新桥的夹道欢迎队列。王文华下马向欢迎的群众致意，口称：“谢谢家乡父老兄弟姐妹！”

我在人群中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大丈夫就

应有所作为。回校后一直在想：处此乱世，只有从军是条报国之路。同时也考虑到大家庭里弟荒多，为了供我上学，家中已早有矛盾，我若考进讲武学校，就可把读书的位子让给别的弟兄，因而立即写信回家，提出自己的想法。那封信中，我借用古人的话，结合自己的想法写道：“蛟龙不是池中物，他日乘雷必上夫。负笈离家已二年，岂期裘锦始归还。功名本是平生望，时局还需下手援。立志请缨年正少，有心投笔砚难穿。”

伯父立即回信，不同意我从军，要我安心把书读好。但我决心已下，终于在模范中学读了两年半后，考进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

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是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建立的。辛亥革命爆发后，改名为陆军讲武学校。

一九一七年冬季，我成为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的学兵。

一九一七年冬季，我成为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的学兵。

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是在清末的陆军小学和民国初年的干部训练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最初，滇军欲插手该校领导权，几次推荐人来任校长。黔军中王文华等人，主张由贵州军界派人当校长，才有自主权。于是从第二期起，由日本仕官学校毕业生、贵州兴义人柯应钦任校长（柯是王文华的妹夫）；贵州安顺人、日本仕官生谷正德任炮兵科长。教学大纲都是参照日本仕官学校的。从第三期起，除了从学生中招考学兵之外，还增设了在职军官轮训的讲习班。

第二期刚入校时，有学兵约二百四十人，分为四个区队。因是按日本仕官学校的训练制度，要求严格，吃不了苦的就中途退学了。到毕业时，只有一百八十多人。第一、二、三学期主要是步兵操练和国文、数学等基础课。第四学期起，按步、骑、炮、工、辎分科。我被分在工兵科。学校从日本购置了工兵必用的一些器材，架桥、修路和筑城教范等，工兵科的学兵都得学。我们曾在南明河上实习架桥，时逢南明中学校庆，方便了群众过河看戏。可惜不几天因涨大水，将桥冲至打鱼寨附近撞坏了，

人们都很惋惜。在这次架桥实习中，同学万贤诗（贵州金沙人）和马兴猷（贵州遵义人）最卖力，得到工兵科长韩健鋸（保定军校毕业生）的赞赏。由于贵州讲武学校的领导和教官都是旧津任官学校毕业生或保定军校毕业生，教学水平较高，很为邻省羡慕。因此，川军、湘军都有部份初级军官被送来参加讲习班学习。同学中，还有几位广西人和一位名叫王雄的朝鲜人。

我在讲武学校学习期间，我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贵州与北京之间虽然山高路远，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但是“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贵阳后，全城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尤以学校教师和学生为最，彼此奔走相告，酝酿成立学生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了康德新和聂鸿逵前来支持并加强联系。几天后，在贵阳的“梦草公园”（现贵阳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成立了贵阳学生联合会，法政学校学生郑少成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黔军司令王文华，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模范中学校长丁宜中，模范中学校长尹笃生，都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学联成立后，警察厅下令不准游行。各校学生极为愤怒，我们讲武学校的学生带头冲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厅长李知白见学生气势很猛，吓得从后门溜掉了。

参加进行的有模范中学、达德学校、法政学校、农林学校和讲武学校等学生数千人，高举“抗议‘巴黎和会’”、“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和“抵制日货”等的标语旗，呼口号，接连几天在大十字和大南门一带作爱国宣传。后来，又转入检查日货，并在南明河畔烧毁日货。在贵阳开设“小林洋商号”的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民怒吼了，吓得赶紧关门逃跑。

“五四”爱国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也震惊了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具有悠久文化的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外来侵略者，是绝不甘心受侵略者的宰割和奴役的。

我们第二期讲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突然在同学中发生了退学的风潮。其原因，据说是邻省的军阀暗地里对贵州讲武生封官许愿，扬言在贵州分配无出路，企图收买贵州军界的后备力量，致使许多人纷纷申请退学。据何辑五（何应钦之弟）告诉我，最后只剩下三个人来递退学申请了。这三个人就是何辑五、朝鲜人王雄和我。为此事，何应钦问我对此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贵州讲武生应首先为贵州着想，不应人云亦云地跟着起哄。何说：“你遇事有主见，这很好。今后更应努力！”接着，何连夜召集学兵训话，指出退学风潮是受人利用。他还明确表示：若有坚持要退学的，可立即出列，我不强留；三分钟后不出列的，就算醒悟过来了，我将其退学申请书当众毁掉。

最后，只有刘万选、郑耀国、曾廷辉和王明泉坚持退学。何说：“你们既已想定了，就退吧！但以后不准来找我。”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了。

初期军人生涯与波折

一九二〇年，我在贵州讲武学校毕业后，留在新兵训练处任排长，两年后升为连长。

一九二四年，讲武学校同学杨砥之（贵州安龙人）在袁祖铭部任团长，他的叔父杨维和、杨维纲，族兄杨镇南，都是袁祖铭部的骨干。杨氏叔侄与我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亲戚，在他们的推荐下，我到杨维和团任营长。

我在袁祖铭部的两年多时间里，走遍了川东的涪陵、酆都、长寿、秀山、酉阳、黔江和彭水等县。黔军多次卷入川军七雄（熊克武、杨森、范绍增、刘湘、郭汝栋、包晓兰、赖心辉）之争，我曾两度负伤，在酉阳与郭汝栋部作战时，我左肩被子弹打穿，被送到铜仁东山上英国人开设的小医院去治疗。这个称为医院的，实际上只有一名外国传教士和两名中国医生（夫妇俩）。我在养伤期间，细想黔军入川卷入川军权力之争，实在毫无意义；加之目睹

袁祖铭部的军官多数吸食鸦片，担心自己被恶习所染，因而决心奔赴革命的策源地——广东。

此时，何应钦已在广东任第一军军长。我以贵州讲武生的关系，直接向原校长提出赴粤的愿望。何应钦通过其弟何辑五了解到我确未吸食鸦片后，立即同意我去广东。与此同时，袁祖铭已任命我为警卫团团团长，但我赴粤的决心已定，不愿到职。袁祖铭也是我的同乡和亲戚，他得悉我的去志坚决后，也不强留，并通知袁部驻武汉的办事处，在我路过武汉时给予方便。

一九二六年夏末，我从四川涪陵坐船直达汉口。袁祖铭部驻武汉办事处的秘书长丁宜中，是我读模范中学时的校长；工作人员朱徽五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又是同乡和亲戚。他们对我都很关心。朱徽五还热情地帮助我准备行装，并代我购了经上海赴汕头的船票。

到武汉，遇见好友杨显之和缪性初，他俩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热情地陪同我在武汉